

• 学术综述 •

敦煌书仪研究评述*

杜 海

[关键词] 敦煌;敦煌文书;书仪

[摘 要] 敦煌书仪文书的内容涉及唐五代时期朋友间的往来书信、世族家礼、民俗礼仪、官场交往等。

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主要从书仪文书的整理、书仪的名实与源流、敦煌书仪与唐代礼俗、敦煌书仪所反映的相关史实、书仪的语言学价值等方面对敦煌书仪做了深入研究。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 100 余件书仪写本,撰写时间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至五代沙州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近三百年间。这些书仪写本,历时千载,模糊残缺亦多。其内容涉及唐五代时期朋友间的往来书信、世族家礼、民俗礼仪、官场交往等内容。1938 年,王重民先生在法国检阅敦煌遗书,即对郁知言撰《记室备要三卷》(P. 3723)、杜友晋撰《书仪》(P. 3442)、张敖撰《新集吉凶书仪二卷》(P. 2646、P. 2556、P. 3246、P. 3249)进行了初步考证,认为 P. 3723 写卷“允当宝贵,以存唐代记室格式于万一”;杜友晋《书仪》“上卷吉仪,下卷凶仪,自天子至于庶人,各具一例,简而适用,故其书能传至敦煌”;《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为张敖随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入长安,“得《元和新定书仪》,归而删纂为是书,以备河西人士之用者。自序不署年月,疑当纂成于咸通间,当时中朝通用元和新定本,而此本遂亦盛行于河西”^①。

之后一段时间,敦煌书仪研究较为沉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先生在《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有对书仪的相关研究^②。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周一良、姜伯勤、王三庆、赵和平等一些海内外学者,对敦煌书仪文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专题论述。既有对书仪源流及分类的研究,又有对书仪写本的校订,对写本的作者、年代的考证,以及将书仪写本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历史或礼仪制度相结合所做的研究等。以下仅就笔者搜罗所及,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作一概要评述。

一 敦煌书仪文书的整理

赵和平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

公司 1993 年版)主要对朋友书仪、综合书仪两大部分做了校录研究。据 11 个敦煌书仪写本(P. 2505、2679、3375、3466、4989 背, S 5472、5660、6180、6246、361 背, 贞松堂本)校录出《朋友书仪》一卷,作者对写本进行了仔细的比勘,较完整的展现了《朋友书仪》的原貌。又校录出 15 种综合书仪卷子:武则天时期书仪(P. 3900)、P. 3681 号唐前期书仪、杜友晋《吉凶书仪》(P. 3442,原有书题及撰人)、《书仪镜》(S 329 与 S 361 拼合)、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 3693 等 9 个写本)、忻州刺史文仪集(P. 5550)、S 1725 号唐前期书仪(不晚于开元年代)、P. 4204 号唐前期书仪(不晚于开元年代)、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仪(S 1438)、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序》(S 6537)、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上(P. 2646 等 8 个写本)、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下(P. 2622 等 4 个写本)、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 3502 背)、晚唐时一种书仪(P. 4050 与 S 5631 拼合)、五代佚名撰《新集书仪》(P. 3691 等 10 余件写本)。综合类书仪的内容几乎涉及唐代士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校录表状笺启书仪 22 种,其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敦煌书仪文书校注》(10YJC770020)。

①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24~226 页。

② 那波利贞:《〈元和新定书仪〉与杜友晋编〈吉凶书仪〉》,《史林》45 卷 1 期,1962 年;《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 1974 年版。

中既有见于史籍著录而早已佚去的作品,如刘邰撰《甘棠集》;也有不见于史籍著录的,如郁知言撰《记室备要》、相州司马判官本《新集杂别纸》;也有出自灵武节度使、沙州归义军幕府官僚手笔的“书状集”、“表状集”;还有出自沙州归义军的“诸杂谢贺”等用口头用语集录,较多涉及晚唐五代历史、地理等相关内容。《辑校》还校录出综合类书仪8种(P. 2042 背、P. 3909、P. 2996、P. 3906、P. 3100 背、S. 4374、P. 3721、P. 4984 背)。

以上两书共检校出敦煌本书仪类写卷100余号,得40余种书仪。校录底本以北京图书馆藏显微胶片所制成之照片为据,并参阅已有的校录成果,录文按照写卷原式抄写,录文后附有校记和题解。题解内容丰富,介绍了前人书仪写本的研究概况及作者对书仪的基本内容、特点和价值等的研究。两书合观,我们可以大致看到敦煌书仪写本之全貌。之后赵和平在《〈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搜集整理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书仪资料。

校录类的文章还有王勇的《敦煌写本书仪录文校补》(《敦煌学辑刊》2009年3期)对杜友晋《吉凶书仪》(P. 3442)、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上(P. 2646)、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下(P. 2622)、《新定书仪镜》(P. 3637)、五代佚名撰《新集书仪》(P. 3691)作了补充校录;黄亮文《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对近年检校出的法、俄藏书仪写卷14个卷号,疑似书仪写卷2个卷号做了叙录,并探讨了各写卷的关系;杨琳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侯赏物第二校证》(《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重新梳理了S. 6537号书仪“节侯赏物”的内容,对写本做了补充校正和研究。吴丽娱的《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王三庆、黄亮文的《〈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王三庆的《〈俄藏敦煌文献〉应用文书研究》(Studies on Functional Document from Dunhuang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AS, in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of Research” 2009)等,也有

对书仪写本的校录勘定。

二 有关书仪的名义与源流的讨论

周一良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开系统研究敦煌书仪之风气。先生就其所见,在书仪的源流、分类、书仪与唐代社会、书仪体现的中日文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高屋建瓴,形成了书仪研究的初步框架。赵和平深受其师周一良先生的影响,曾自述说自己“十几年来,得以聆听教诲,享受了别人很少能得到的这样一种待遇,只能用‘缘分’来解释”^①。周一良先生的成果为书仪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空间。先生在书仪的分类、源流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书仪即格式化的书信,包含书札和礼仪,根据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朋友书仪》,专叙友朋思念之情,其渊源可溯自索靖的或更早的月仪,将故宫博物院所印金朝以来流传的《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与《朋友书仪》中《十二月相辩文》作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第二类是综合书仪,又称吉凶书仪。此类书仪唐以前较少,至唐代成为书仪的主要形式。周先生还理清了唐代书仪的发展过程,唐初裴矩、开元杜友晋、元和中郑余庆、长兴三年(932年)刘岳先后制定书仪,大致每经百年上下,“士大夫之风范”即因时代及社会变化而有所变化,书仪纂订的目的是制定士大夫行动的准则,维护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地位。第三类是涉及各方面公私事务的表状笺启书仪,既非按月编排,又不分吉凶两类,其时代以五代宋初居多。又《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一文遍检史籍,同时搜罗日本史料中古代中国书札传入的相关记载,详细考察了自西晋至清代书仪的渊源与流传,指出流传至今最早的书仪作品是西晋书法家索靖的《月仪帖》。南北朝时期,书仪的内容更为广泛。《隋书·经籍志》所载南北朝时期书仪性质的著作11种,其中出自王谢高门之手的书仪有五种。掌握这些书信的风格和体裁,是体现世族高门文化修养的内容。唐代的书仪,主要有裴茝撰、朱侑注《书

^① 赵和平:《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学术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仪》，郑余庆《郑氏书仪》，裴度书仪，杜友晋书仪，郑珣瑜书仪，张敖书仪等。五代梁唐之间有刘岳《吉凶书仪》。宋代有胡瑗《吉凶书仪》、司马光书仪。南北朝时期的书仪在唐代还有适用，宋代书仪则主要沿袭唐代。元代有《启札青钱》、《居家必用事类》，《启札青钱》中引用前代的著作主要有刘岳和司马光的书仪。书仪以书札范本为主而兼包礼制，是六朝以来的传统，而发展到唐代又有“婚礼仪注”、“凶礼仪注”、“丧服制度”等，包括一些家礼的内容。司马光书仪中，书札范文和例句减少，礼节部分增多。到元代进一步发展，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明代有《如面谈新集》，清代有《宦乡要则》等，都是私家书札、公文程式之类的书。

赵和平最早对朋友书仪进行了专门探讨，《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一文，对敦煌《朋友书仪》的文体、渊源、特点做了详细说明，分别论述了朋友书仪的三部分内容：牒列气候用语（即十二月相辨文）、书仪正文、求官的别纸。对书仪小注的内容给予特别的注意，认为小注不仅包括史实，也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小说等。继而探讨了《朋友书仪》与齐梁时书札的渊源关系，指出《朋友书仪》的主要内容源自南朝，将《朋友书仪》的节候用语与《初学记》、《御览》中引《梁元帝纂要》的对应部分比较，因袭痕迹甚明，且从文体特征上也可以看出《朋友书仪》是齐梁文风影响下产生的作品。朋友书仪的特征主要有：1. 文字比较优美，带感情，对仗工整，用典贴切。2. 书札叙离别之情，生活及时代气息甚浓。之后，赵和平在《敦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版）中提出敦煌书仪写本有两种情况：一种原有书题和尾题称“书仪”，朋友书仪与综合书仪属于此类情况；还有一种没有明确书题，但根据其性质可以视为书仪，即表状笺启类书仪。对于三种类型书仪的关系，赵和平认为《朋友书仪》是最早形态的书仪，后并入综合书仪，并进一步发展表状笺启书仪，杜友晋《书仪镜》应是表状笺启书仪的滥觞。敦煌本《朋友书仪》的信札酷似齐梁名篇，《朋友书仪》的文体可上溯自齐梁时期的书札。《新定书仪镜》中以血缘关系远近定服制轻重的办法渊源于先秦的《周礼》和《仪礼》，这为我们考察书仪的源流提供了一条线索。后来赵和平在《敦煌

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提出，表状笺启类书仪是广义书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中有对唐代官僚社会中曾经使用过的往来尺牘的改造和修订。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敦煌文学概论》第14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书仪据其文学性质可以分为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类。仪注型是指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着重体现儒家的礼仪规范；专题型包括朋友书仪，释门文范，官牒样式；实例型指把实际应用文书作为写作参考样本的一种书仪。

王三庆《论敦煌书仪之名义与源流》（《唐代文学论丛》，台湾中正大学1998年版）认为，论书仪之名义与源流，需从负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责任的史志目录入手。文章详细考证了书仪的内容、渊源与流传，考订了书仪的分类及标准。通过对《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篇》、新旧《唐志》、郑樵《通志·艺文二·礼类第二·仪注》中所存书仪名目的检录，得存录《书仪》34部，其中至今可见的只有敦煌出土的杜友晋《吉凶书仪》与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根据尚存书仪的内容，可以大致还原综合书仪的体例包括“吉仪”与“凶仪”两部分，每部分各有凡例，并有书仪节候、官吏僚属的式表起居、四海、内外族、妇人及僧道往来的书信仪节、吊答言辞、祭文丧服等类别。文章还将敦煌本《朋友书仪》、故宫藏本《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类书中的片段《书仪》做了比较研究。该文认为书仪最早属于仪注类，仪注类原出于经部《仪礼》，隋唐以后渐入史部。文章最后厘定了书仪的范围，即仅限于吉凶礼仪的书面范本或言语应对之文字，《杂斋文样》、《释门范文》之类当排除。

陈静的《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别纸的四种含义：1. 另外的纸；2. 另外一封信；3. 复书第二纸的别称；4. 文件（书信）的附件。文章提出别纸源于南北朝时期。陈静《书仪的名与实》（《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认为，书仪包括书札与礼仪两方面的内容。

吴丽娱《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文史》2001年第3辑）一文，首次据书信和官文书的发展历程来探讨书仪的渊源。在魏晋南北朝重文的传统和风气下，私人书信和官文书都需要优美

的文辞,形成了显示世族博学和修养的“尺牋之学”,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时世所需的朋友书仪、综合类书仪、表状笺启类书仪,其中表状笺启类书仪作为一种公文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显著。文章围绕“尺牋之学”的发展演变,将魏晋南北朝和晚唐五代官文书产生的基础和背景联系起来,做了对比研究。魏晋以降是表状笺启公式文的成熟期,魏晋的表状文集是汉末以来分裂战乱的国家形势的产物。唐代表状笺启书仪的出现是时势的需要,并深受晚唐五代政局影响。魏晋南北朝记室文章已开唐末藩镇幕府文学之先河。

吴丽娱的《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第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考察了复书与别纸的来源、意义、内容形式及其时代性和实用性。书札中言及私事,若与固定格式的体例不合,就会于正式书札外另附复书或别纸。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复书,至唐以后逐渐简化,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形式的应用不断减少。而在晚唐五代公文尺牋即“表状笺启书仪”中,“别纸”作为另一类型的“复书”被广泛使用。这反应了两种趋势,一是贵族创造的繁琐礼节随着庶民社会的发展走向简约,二是官僚阶层代替贵族士大夫推动了繁文缛节的滋生发展。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9月)认为,《朋友书仪》可能最早源于“尺牋”文书。中国书函之创制,东汉刘睦作草书尺牋十首,为尺牋之首见。受诸子之《十二记》、《大戴礼记》、《礼记·月令》的影响,月仪类作品于晋世产生。文章对月仪类文献做了详尽考述。

这方面研究的文章还有王伟的《朋友书仪》(《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赵和平的《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及格式》(《光明日报》2006年2月20日第11版),金传道、王宁的《“书仪”内容辩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书仪的名义与源流。

三 对书仪写卷定名、年代、历史背景等的研究

如果说王重民、周一良先生是敦煌书仪研究的开创者,那么赵和平则是用力最勤、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他有关敦煌书仪研究的论著除了以整理书仪写卷为主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的《唐五代书仪研究》和刚刚问世的《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这两部论著体现了周一良、赵和平二位先生书仪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对敦煌书仪写卷情况和基本内容所作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此外,李正宇、张锡厚、吴丽娱等以及台湾学者王三庆、黄亮文都对书仪写卷的定名、时代等问题做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1.《朋友书仪》写卷的相关研究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一文,对《朋友书仪》的相关内容做了考订,文章将朋友书仪写本分为三个抄写系统(即有三种不同的抄写底本):一、P.2505、3375、3466、3429;二、P.2679、S.5472、5660、361背;三、P.4989背。另外S.6249、S.6246、贞松堂本、上海图书馆本所存极少而未能确定属于哪个系统。在国内史籍著录中未见有《朋友书仪》类书籍或文集,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目录》中有许敬宗撰《月仪》四卷。写景见长、以四六言体为基本形式的《朋友书仪》可能是许敬宗编撰,后人耻其为人,在传抄时故意略去其姓名,所以现存敦煌残卷中未见撰人。敦煌本《朋友书仪》残卷包括专供远在边陲的随从官员使用的书札范文,也附有一般人书疏往来的参考。

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对书仪的结构、文体、产生年代以及制作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从文体上看,《朋友书仪》反映唐代特别是唐代中后期骈体文的运用在书仪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据书仪中“晋地、晋庭、晋邑、尧都”推测,书仪作者的家乡应在唐代河东,即今山西境内。该文通过对丰州、胜州、灵武和朔方道水陆运使的考述,认为《朋友书仪》的作者是晋地到边疆服役的人,这与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一编《唐开元天宝之交为一时世转变期的考证》的看法基本一致。该文推断《朋友书仪》产生的年代应该在唐朝改灵州为灵武郡的天宝年间。吴的考证也不能完全否定许敬宗编撰《朋友书仪》的可能,因为《日本国见在目录》中确有许敬宗撰《月仪》四卷,吴也认为敦煌本《朋友书仪》可能是作者根据他的生活环境与内心境遇改编自中原本的《朋友书仪》,而中原版本的

《朋友书仪》很有可能是许敬宗编撰,至少应该与许敬宗《月仪》存在渊源关系。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学》第25辑,2004年版)再次全面系统地对《朋友书仪》进行研究,认为该书仪为边塞地区的僚佐编撰,供边城地区僚佐役士写作信函时参考,编撰年代在温池设置与王忠嗣在天宝中奏置经略军于榆多勒城之后,或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之初。

2. 综合类书仪写卷的相关研究

赵和平《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文,对S 6537号书仪写本进行了研究。写卷的前30行为序文,详尽叙述唐代书仪的内容、作用、沿革,颇为珍贵。《郑氏书仪》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皆有著录,司马光《书仪》中亦有引用,南宋以后史籍中不见记载。据两《唐书》考证,韩愈、裴蒨也曾参与书仪的编撰,《郑氏书仪》的编撰年代在元和六年和元和七年间(811年~812年)。又考该《郑氏书仪》写本是文宗时抄写。《郑氏书仪》30篇,分为6类,第一类节候用语、节候赏物、节假日等一般性规定,第二为公中表状笺启式,第三是吉凶书仪,第四是婚丧仪注,第五为凶书仪,第六为丧服图制。赵对这几类内容做了详细考察,论述了该书仪的价值。《郑氏书仪》是元和后通行全国的权威性书仪,远至西陲,迄于后唐,无不受其影响。文章认为,敦煌写本《郑氏书仪》保存的唐代节候赏物的相关史料最为丰富、完整。

赵和平的《武则天时期的一种敦煌写本书仪——P. 3900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考订了P. 3900号写本的性质、编撰年代。通过与敦煌写本中几种综合书仪内容、体例的比较,定此写本正面所抄为综合类书仪。根据正文的避讳、以十一月为岁首、称洛阳为神都等内容,推断该书仪的编撰年代可定为武则天时期(684年~704年)。论文又据写本抄本中许多字并非武后时新字,认为该写本是武则天以后的重抄本。

黄亮文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究》(1984年),将张敖书仪与唐宋礼书及其他书仪做了比较。赵和平的《晚唐时代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文献》1993年第1期),对晚唐时

代的三种吉凶书仪做了研究:第一种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虽以上下两卷为题,实则只有吉仪部分,均不见凶仪,经考证P. 2622、S 1040、P. 3886、P. 3688第2纸,这4个写卷可能是《新集吉凶书仪》的“凶仪卷下”部分。《新集吉凶书仪》的撰写时间应在宣宗大中年间(847年~859年)。第二种张敖撰《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已知敦煌写卷综合类书仪中最为简略的一种,是《新集吉凶书仪》的简本,撰写时代稍晚于《新集吉凶书仪》。第三种五代时佚名撰《新集书仪》应当出现于后唐庄宗时期,受到后唐新修礼仪的影响。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则承袭了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且删去了《郑氏书仪》中不适用于河西归义军辖区使用的部分。《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五代时佚名撰《新集书仪》,均承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作者还探讨了综合类书仪的全面性、口头用语、使节用语以及瓜沙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一致性问题。

赵和平《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对P. 3442《吉凶书仪》,S 329+S 361《书仪镜》,P. 3637、P. 3849、P. 5035、P. 5020等9个写卷《新定书仪镜》做了详细考察,认为杜友晋《吉凶书仪》成书于开元末,《书仪镜》成书于开元末天宝初,下限不会超过天宝六年;杜友晋是开元、天宝时代人。《书仪镜》是《吉凶书仪》的简本或缩写本,《书仪镜》和《新定书仪镜》在内容上更加简便实用,因而流传更广。二书凶仪部分相同,吉仪部分有较大不同,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书仪的内容也发生着变化。

荣新江《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天津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认为,S 6111+S 10595即S 329+S 361《书仪镜》中的《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并且认为《书仪镜》受到杜友晋《新定书仪镜》的影响,但并非杜友晋所作。根据《书仪镜》吉仪部分《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记载的“平蕃”事件,可知其明确为安西史事。《书仪镜》成书年代有两种可能,一是高仙芝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前后的天宝六至八载(747年~749年),二是封常青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天宝十二至十四载,且文书中提到的马麟正是开元末至至德初人,因此把《书仪镜》成书年代确定在天宝六载至十四载间(747年~755年),编撰者是安西四镇节度使麾

下掌书记一类的官员。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据书仪中“二兄”、“二郎”、《旧唐书》中“封二”等行第称谓,结合史料记载封常青平定大勃律的经过和封氏任节度使时期的西域形势,推断书仪中所载事件的主人公是封常青。

黄亮文《〈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敦煌学》第27辑,2008年)一文,对《新定书仪镜》相关写本做了细致的考订,理清了相关写卷的关系并重新做了定名,如P.3637《书仪镜甲本》、S.329+S.361《书仪镜乙本》、P.3849及P.5035A+P.3688A+P.5020+P.5035B+P.4036《新定书仪镜》等,另外考定《新定书仪镜·序》是抄自《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的序文,文章通过校勘、缀合、版本、内容探讨对《新定书仪镜》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方法值得借鉴。

3. 表状笺启类书仪写卷研究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三]总第24期,1995年)一文,考察了P.3931号书仪的编撰年代、作者身份、所属地域等问题。该写本作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底或四年(926年)初,书仪原作者是朔方节度使幕府内的判官或掌书记之类高级幕僚,可能是代回鹘草拟本,也可能是草拟之后的录副存档。因其有教材的功能,所以在表本、书本、十二月书仪之中杂有僧牒、游五台山记等有关僧人的内容。文章指出,P.3931、P.3449、P.3846、P.4092、S.5623等均为册页,似为在内地抄录后带回沙州归义军的,反映了同光二年(924年)甘州路通之后内地与西域的频繁往来。P.3931号写本揭示了五代时朔方节度使与甘州回鹘以及凉州、肃州、沙州等地的密切关系,体现出朔方在沟通中原与西域地区交通中的咽喉地位。

赵和平的《〈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新集杂别纸》属于表状笺启书仪的一种,有两种不同写本P.4092与S.5623。文章介绍了两写本的形制与内容,认为该书仪是五代后唐时相州马姓判官撰集而成,作者是相州幕内的高级幕僚,该书仪的编撰年代

在后唐长兴年间(930年~933年),写本抄写年份在965年。文章还对《新集杂别纸》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做了考证,如后唐灭蜀后转运蜀地财富入洛阳事、高从诲归化后唐事,天成中(926年~930年)平定王都之乱事等,指出该书仪写本的文献学价值。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文,主要对P.3723号写本郁知言《记室备要》进行研究,同时论及另外几种《记室备要》写本P.3723、P.3451(Bis)、S.5888的形制。郁知言《记室备要》共存上、中、下三卷。上、中卷及下卷一小部分仍存,共94篇,计状启等129首。下卷大部分佚去,据下卷篇目可知所佚部分为“荐官寮”、“荐医人”、“荐僧道”等80篇。《记室备要》中卷记载了19种内诸司使职务,为唐代宦官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中尉、军官、长官三者事权有别;书仪中载“仗内史”、“琼林大盈库史”、“牛羊史”、“兼知太仓出纳”此四职可补前人著述之不足;《记室备要》中的“长官”即是传世文献和《甘棠集》中的“枢密史”。

吴丽娱的《关于S.078v和S.1725v两件敦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二者内容不出官场中求官求迁、候问长官僚属起居寒温及谢贺启状等范围,当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表状笺启类书仪。考证S.078v书仪内容为唐末李克用的相关史事,成书年代在大顺二年(891年)前后,书仪中“梁王”、“四镇”等所指是朱全忠及其事,又据文中的避讳推断其抄写于后唐时期。S.1725v反映的是地方权力的强势,书仪中的某些词语是唐末五代的习惯用法,因此推断书仪的成书时间在唐末五代。

表状笺启类书仪多编撰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社会动荡时期,有些写卷包含的内容复杂,引起学者的讨论。

周一良先生的《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首次以P.3449为中心考察了书仪的内容、程式、历史背景。先生据写卷的册页形式,推测其抄写时代较晚,并对书仪中的文书名称“榜子”、“散语”、“门状”进行了考察,揭示宋代文书程式与唐代风习之继承关系:古代的刺发展成唐代的门状,又由门状简化成榜子,并且对唐

代书信封皮的形制做了详考。文章还对书仪涉及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考察,如州刺史与中央朝廷、藩镇节度使的关系。陈祚龙的《看了周作〈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以后》(《敦煌学》第6辑,1983年)认为,P.3449与P.3846号写卷可拼接为同一书仪,作于五代后唐时期。赵和平《后唐时代刺史专用书仪——P.3449+P.3864的初步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文,同意陈祚龙P.3449与P.3846为同一文献的判断,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对写本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排列。论文据书仪中“洛京”、“密院门”和相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判定该书仪撰写于后唐明宗后期。后唐同光年间“授归义军留后为节度使”、“授韩洙为灵武节度使”、“授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说明中原经朔方、河西走廊经瓜沙至西域道路的开通,书仪的内容也反映出沙州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的交往。

王三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探讨了《诸文要集》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诸文要集》是8世纪中叶以后,学仕郎李英抄写或编辑的关于佛教通俗文章的应用文集,就源流而论当属于书仪。赵和平《〈诸文要集〉性质初探》(《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文,将北大图书馆藏D192号《诸文要集》残卷与P.2940、P.2546等卷《斋琬文》的文体和内容进行对比,认定《诸文要集》是《斋琬文》的简本,其性质为供僧人参加各种僧俗活动时念诵用的“文范”,并提出《诸文要集》不属于三种书仪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李正宇的《曹仁贵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11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对P.2945号写卷做了校录研究,认为该书仪作于900年至924年间,文中署名“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是指曹议金。吴丽娱的《再析P.2945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从“朔方节度使出身”、“曹元德、曹元深兄弟二人的地位”、“书仪的性质和内容”等方面,对写本涉及的历史事件做了考证,认为P.2945书仪记载的是曹元深天福七年(942年)遣使后晋事,并分析了灵武节度使在曹氏归义军通使过程中的作用。杨宝玉、吴丽娱的《P.2945书状与曹氏归

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对P.2945写本重新考察,并做了校录注释,理清了书状的结构形式,认为书仪是曹议金时期所作,反映的是同光二年(924年)到朝的归义军使团出发前的情况,状文作于923年7月9日前后。文章对书仪所涉及的朝贡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事件做了详考。

赵和平《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文献》1994年第4期)一文,对P.2481号敦煌写本做了初步探讨,认为该写本可能在永徽至垂拱(650年~688年)这一段时期内形成;写本的抄写时代较晚,可能下延至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并且指出P.2481号写本是唐前期尚书礼部所属之礼部、祠部据留司格文拟定的公文书式,其内容是下地方政府及下寺监等事务机关的公文。文章考察了该写卷的内容,认为它不符合书仪体例,当不属于书仪三种基本类型的任何一种。周兴涛《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再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敦煌P.2481写本是一本供人模仿练习用的拟判文,属于广义的书仪。它与敦煌本《文明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中的判词一道成为重要的唐代判词史料。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邺生年新证》(《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一文,论述了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性及其文献价值。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对表状笺启类书仪《甘棠集》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专著,包括对《甘棠集》写本的性质、《甘棠集》作者刘邺等的研究和对《甘棠集》的校注。附论部分的几篇文章《高少逸陝虢幕府与白敏中邠宁行营幕府的比较研究》、《再谈湖南李中丞(汶儒)》、《刘邺年谱简编》等还对相关史实做了考证。对于赵和平研究之贡献,饶宗颐先生在《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书中考证刘邺曾为翰林学士承旨,复补考湖南中丞李汶儒之行实,皆其新创获。于集中各篇,一一为校注,勾稽撰写年月与收件人之士履颠末,采据充实,使人了然于唐代典制,大足为读本书者之助。至于尚论中晚唐进士科,多循幕府迅升,跻位卿相,此一终南途径,影响及于北宋以来文人主政之新局,犹征其史识之卓越……至于考索邺入翰林前历官之曲

折经过,处处均见考证之功力。”

四 结合书仪对唐代礼制、民俗的研究

唐代礼俗是敦煌书仪的重要内容。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将S 1725等书仪写本与《开元礼》中所载婚、丧礼俗分别作了比较。论文认为,婚礼方面,书仪文书记载的“以鹄代雁”、“晚间举行婚礼”、“就妇家成亲”、“却扇之仪”等,既反映出敦煌民间礼俗与古礼和朝廷礼仪的一致性,又凸显民间礼俗的灵活性、实用性及存在的一些迷信陋习。丧礼方面,书仪着重于处理各类书信往来以及各种场合下人际间的交往关系,因此丧礼中庆吊行动的若干细节,在书仪中得到体现,这补充了《开元礼》之不足。书仪中各种场合下的口头吊丧词和丧主的答词,是《开元礼》所不载的极生动的社会风俗史料。可以看出讲皇室和各级官吏礼制的《大唐开元礼》并不适用于一般庶民,而书仪则起到礼仪规范的作用,在民间广泛流传。论文还特别指出P. 2622中的“坟高制度”不同于历来文献中的记载,可能是元和中所定《曲台新礼》或《续曲台礼》的规定。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书仪编撰的最初目的是维护世家大族的行为准则,同时书仪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世家大族的兴衰过程。书仪正文中平阙格式、称谓、书札用语及服图四个方面,对君臣上下、尊卑长幼、亲疏远近有严格规定,揭示了当时社会中等等级森严的尊卑关系。书仪在发展过程中,各类场合口头用语的加入、门风礼仪的要求不再严格,反映了世家大族的逐渐衰落。同时,敦煌书仪的口头用语自有其特点,可以丰富唐五代社会文化研究的内容。文章提出敦煌文化的源头是中原文化,因受各民族文化的影响而独具魅力。敦煌起到了沟通中原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又《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对书仪中有关妇人书札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并探讨了唐代妇女“女、妻、母、婆”四种角色在吉凶书仪中的使用规定及其身份在往来书札中的体现,唐代夫到妻家成礼并随妻长期居住等问题。

姜伯勤的《唐贞元、元和年间礼的变迁》(《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中亚史研究中心1993年版),从三礼之学和“仪注”之学间的关联,把握贞元、元和年间礼仪流变的特点,开辟了新的视角。论文认为,为了加强王权以扼制藩镇势力的膨胀,同时通过整备家礼以整顿私家仪式的逾制,唐王朝呈现出贞元、元和年间礼制和仪制的变局。贞元年间的《大唐郊祀录》与元和年间的《礼阁新仪》等“变礼”、“新礼”的出现,既反映出中央对礼制革新与整备的措施与愿望,又反映了礼向简约化、实用性发展的趋向,即忽视礼的实际内容而偏重于礼的“仪注”形式。《元和曲台新礼》和《续曲台礼》即是元和年间礼仪制度新旧交替的写照。尤其是敦煌P. 3249《元和新定书仪》与S 6573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将士族家礼、家训和通行习俗大量收入吉凶书仪,其中《郑氏书仪》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五代宋初。贞元、元和年间礼的变迁,强调了王朝正统性及中央集权绝对性。元和年间将士庶家礼纳入吉凶书仪的做法,将习俗提升为礼仪,开启了唐末至宋初礼仪日益日用化的新时期。

王三庆也较早关注敦煌书仪与民俗之关系,《敦煌书仪载录之节日活动与民俗》(《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正大学1995年版)一文,将敦煌书仪中存录的节日活动一一呈现,并据其特点归纳分类:一是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民间节日,如“元日”、“人日”、“寒食、清明”、“三伏日”等,既是提醒民众适应节气的寒暑变化,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二是宗教节日,如“佛诞”、“浴佛”、“中元”等佛教庆典;三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节日活动,如“皇帝生日”、“七庙的忌辰”等,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唐代政府与民间一年中的重要节日,在书仪中得到整体的呈现,使唐令中几近消失的公休假日复现,最能体现这些节日记载的重要价值。又《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与程序》(《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对敦煌书仪写卷等资料中记载的婚礼资料做了详细梳理,并尝试还原了当时社会的婚礼程序。如男家“纳采”的求婚书函及仪式;女家“纳采”的接待仪式与回复书函;“纳征”仪式及媒使带去的礼物如羊、雁、酒等的意义;迎亲的过程包括成礼夜儿家祭先灵文、至妇家礼、女家出门的仪式、女方到家成礼仪节;亲朋对婚家婚礼之回复祝贺。从中可以看出当

日士大夫及民间婚姻的基本程序以及民间对婚姻的严谨态度,并了解唐宋迄今的婚礼沿革。

吴丽娱对唐代礼制的研究颇有贡献。《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详细考察了隋唐时的行第称谓,结合唐代民众社会心理、民俗等做了综合探讨。吉凶书仪中行第与官位可以同时称呼,《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将行第置于官称之下,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攀附。书仪还反映出妇女在参加个人、家庭信仰及宗教事务时署名亦称行第的情况以及普通民众为增加彼此感情、表达兄弟间至交的情谊而使用行第称谓,在感情上、礼仪上都给人一种超乎等级地位的平等的感觉。行第称谓流行的原因有三:一是行第称谓由士大夫向民间的普及,二是普通百姓在交往中对称呼行第的爱好,三是隋唐的大一统打破了南北朝世家大族的统治。行第称谓最初受东晋南朝世族风气的传染,唐代以后北俗胡风“兄弟情结”又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代表了当时社会人士所独有的社会风范。

吴丽娱的《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P.2967“杜佑《丧礼服制图一卷》”、P.3637《杜友晋吉凶书仪丧服图》、P.4024《书仪》中“丧服仪”、“服衣仪”起到了解释、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的作用。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衰服制度”也包含《丧礼服制图》一类的服衣图。文章通过探讨《丧礼服制图》的渊源与内容,展现了唐代礼仪制度通俗化的进程。

吴丽娱的《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认为,写本中的丧服礼制与《开元礼》不同,反映的可能是后梁、后唐之际礼制,该写本的服制图可能是后人抄写过程中根据其生活时代的礼制对原书仪的服制图作了修改,故该写本的抄写年代在后梁、后唐之际,书仪中“新礼”制度则可追溯自唐后期。

吴丽娱的《敦煌书仪中的贺官》(《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考察了“贺官仪”的发展趋势,即以“官”为对象的贺仪数量增多,超过给皇帝的笺表,反映了官场之礼从朝廷到藩镇、从中央到地方,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渗透到唐朝官僚社会的

各个层次和环节,并成为官场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礼仪在普及过程中已经由皇帝为中心的一元化向藩镇体制多元化转移。

吴丽娱另有《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一文,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认为不同时期书仪类型、重点和内容倾向的变化,反映了中古转型时期人文心理的变迁。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制作的书仪以家法家仪为基础,体现了世族高门的意识与追求,而随着世族的衰落,书仪平民色彩愈来愈突出;唐代是皇帝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在国家权威至上的时代,书仪内容反映了朝廷礼制,随着藩镇实力增长,书仪又体现出朝廷仪制约束地方和民间社会生活以强化中央集权;晚唐五代时期,表状笺启形式为主的官牍文范成为书仪的主体,反映了藩镇政治的发展。书仪制作由地方世族到中央皇权再到地方官僚,其功能由贵族专用到中央集权推广再到官场仪范,这种轮回进程体现了唐宋之际官僚社会的逐渐成熟和庶民化社会的必然趋势。

《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同期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认为敦煌书仪在基本采用朝廷正礼的情况下,也吸收了民间俗礼。在变礼的过程中,可以反映出夫权加重、妇女地位下降的趋势。贞观、显庆、开元年间的礼逐渐变化,至唐后期五代这一进程继续,直至宋初重新整顿而完成了中古书仪的变迁。唐以前世族家礼为主要特色的吉凶书仪,到唐代逐渐有了愈来愈多代表官方制度的成分,书仪成为朝廷正礼与民间习俗交接的桥梁,发挥了宣传和推行朝廷礼仪的作用。

吴丽娱的专著《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是书仪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吴先生对书仪研究做了总结,并在诸如朋友书仪的作者问题、复书与别纸的流变、表状笺启类书仪的渊源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该书以书仪为中心对唐代礼制做了系统研究,展现了唐代由政府到民间礼俗的整体面貌。王永兴在本书《序》中高度评价吴丽娱在书仪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

五 通过书仪资料对唐五代社会历史的考察

敦煌书仪文书对于唐五代时期西域历史、地

理的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80年代起,史苇湘、李正宇、姜伯勤等学者已经有了此方面的研究,后来赵和平、吴丽娱等学者的研究更有所推进。

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考察。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一文,考察了S 1438号书仪写本中记载的吐蕃时期沙州玉关驿户汜国忠、张清等的起义。史苇湘的《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12月),根据S 1438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仪的有关记载考察了敦煌陷落的时间应该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建中二年(781年)。有关敦煌陷蕃时间在贞元年间的说法(戴密微的观点)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敦煌陷蕃后沙州民众的起义此起彼伏,与吐蕃统治者发生多次战与和,而使人产生的误解。“而唐蕃两国在沙州管辖权上的易手,则只能是建中二年。”杨铭的《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S 1438背〈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考证Fr80号藏文文书与S 1438号背《书仪》的作者是同一人,两件文书所载事件的时间、内容基本一致,即建中二年沙州首次陷蕃后,至贞元六年(790年)前后,其地发生的汉人反抗吐蕃统治的起义经过。

对归义军政权的相关问题考证,主要有李正宇先生《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版)、吴丽娱先生《归义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杨宝玉、吴丽娱先生《梁唐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等。

对灵州道及凉州节度使的考察,书仪写本P. 3931、P. 2945等为探讨晚唐灵州道、朔方和凉州节度使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信息。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赵和平《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1997年版)、赵贞《敦煌文中书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2001年第4辑)、《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李军《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

期)、《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

六 敦煌书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70多年来,敦煌书仪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对散见于敦煌文书各卷中的唐五代时期的书仪进行了系统的搜罗整理,并理清了各卷的关系。第二,弄清了书仪的源流,并且在社会史、礼俗史、语言学等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展现了敦煌书仪丰富的文化内涵,揭示了其文献学、文体学等方面的价值。当然,敦煌书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进行综合性研究。赵和平耗费10余年工夫将书仪写本作全面搜罗、校录,并对写本的基本情况作了细致考订,为书仪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就现有成果看,研究性的论著,只有吴丽娱《唐礼摭遗》、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其他领域,学者涉及的还比较少,体现在没有相关的专著,系统论述的文章还不多。今后,书仪研究应推进敦煌书仪与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的相关内容的结合,将敦煌书仪放入整个中国礼制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不仅要开辟出书仪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要注重不同学科的综合。具体来讲,书仪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将汉文书仪文献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体裁类似的文书进行比较,研究敦煌地区各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的进程;结合书仪所属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地域风格,对书仪写卷进行校读、注释;通过书仪的语言特点和仪注形式研究书仪的思想文化内涵;通过适用于不同场合下的各种特定书仪范式的探讨,还原官场、民间等各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将不同时代仪注类史料做对比以探讨其内容、文体的发展演变,等等。

其次,应该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敦煌书仪校注本。目前敦煌书仪文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只有赵和平的校录,尚未有学者作注,这与系统整理敦煌书仪文书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笔者认为,若要研究进一步深入,对敦煌书仪文书进行注释是一项重要也是必要的工作。系统的整理校注,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敦煌书仪文书本身,还有利于敦煌书仪作为文献资料应用于更广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从书仪的内容看,朋友书仪

中引用的典故上自《楚辞》，下至齐梁时代；综合类书仪内涵丰富，几乎涉及唐代士庶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状笺启类书仪涉及晚唐五代历史、地理的内容特别多。因此，书仪校注应既重视语辞的注释，又重视史实的考证，二者不可偏废。具体语辞的注释，不仅解释字词本义，而且要通过对词句引用出处、用典出处的考察并结合特定语境作出准确的注解。史实的注释当建立在史地研究的基础之上，广泛搜罗文献资料并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合理解释。总之，对文书的注释，应做到精细、广博，对写卷内容的研究，应力求深入。

再次，研究方法需要创新。作为通信书札和日用礼仪的参考文范，书仪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研究书仪文书应充分考虑到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书仪作为应用文，有其独特的范式和语言特征，其中必然透露着历史背景、人物身份、职官、地理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作为士人书信的参考，出于表达主观感情的需要，书仪还非常贴近实际的生活状态，能较好地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习俗、人情世故相结合；而且时代的差别、地域的不同，书仪的语言及文体特点也会有差异。研究书仪文书应充分挖掘文书所包含的各种信息，分析写卷之间的相互关联，包括同一时间段相关文书内容的横向联系和不同时间段某一地区文书内容的纵向联系。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引沈佺言：“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①《朋友书仪》是齐梁文风影响之下的作品，其内容主要源自南朝，唐开元天宝后《朋友书仪》逐渐并入“综合书仪”，继而发展为“表状笺启书仪”。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根据敦煌书仪还原有唐一代礼仪制度的大致面貌，如吴丽娱著之《唐礼摭遗》，还可以向上追溯南北朝时期礼制向唐代礼制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书仪研究的

方法、思路尚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最后，研究深度上应进一步挖掘。赵和平说过，“我们只是提出和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②。王三庆认为，“然而检校著录（著录是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移录已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至于研究，犹待后者之研究深入”^③。敦煌出土书仪文书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倘若我们深入挖掘，其对于唐五代时期西域史地、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乃至整个唐五代史的研究都应当有所贡献。

回顾过去的研究，敦煌书仪文书没有像其他文学类、历史地理类及社会经济类等敦煌文书那样，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其在文体上属于书札、仪注类的范文，格式相对单一，隐含的信息不容易被发掘，这是书仪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也正意味着它提供的某些信息，或在某些方面的功用，是其他文书不可替代的。因此，敦煌书仪文书需要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参与研究。“众人拾柴火焰高”，随着书仪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加入，相信敦煌书仪研究必将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论文和论著。

收稿日期 2011—12—20

作者杜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甘肃，兰州，730000。

【责任编辑 殷 铭】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页。

②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

③ 王三庆：《敦煌书仪载录之节日活动与民俗》，《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正大学1995年版，第14页。